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杨 奎 松

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民族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必然是一种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但是，作为一种外来的却是被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能不经历许多极其复杂和曲折的情况。本文即试图对此作一初步的考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尝试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核心就是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即中国的实际，并使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自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开始了。

众所周知，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1919年以后特别是俄国共产党人的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到中国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形态，首先是以强调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为主要特色的列宁主义的形式传入到中国来的。而那些在维经斯基等人协助之下组成了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进而在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之下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们，最初自然不能不以俄国共产党人为榜样。随着中国共产党很快成为同样依照俄国党的模式组织起来的共产国际的

下级支部，它所处的地位更加复杂。因为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规则，不仅中国共产党必须“无条件地遵守最严格的国际纪律”和“毫不迟疑地”执行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而且还必须接受共产国际派出的具有“最广泛的权力”的全权代表的监督和指导^①。这样一来，只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受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理论影响的中国共产党人，其头脑当中的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充满了俄国的味道”^②。在他们这时所起草的文件当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其中的浓厚的俄国色彩。这时的共产党人不仅几乎完全沉浸在对俄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之中，而且明确认为：“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俄国革命的方法，必然也是中国革命的“不二法门”，俄国的革命靠的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产业组合”实行“总同盟罢工”，中国的革命也只能是一样，因为“从生产和分配的方法上看起来”，世界上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式的”。进而，他们甚至几乎一致认为，中国革命也只有象俄国一样实行社会革命才有出路，即必须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为最直接的斗争目标^③。

但是，中国是否具有与俄国同样的发展条件和革命条件呢？在那些明显地留有俄国人笔迹的中共最初的历史文献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早期共产党人把中国和俄国等量齐观的情况，他们显然认为中俄两国都处于大致相等的发展水平上，即两国都是“农业国”，只是“大”、“小”有别罢了。既然并不比中国发达多少的俄国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条件相近的中国不能如此呢？何况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俄国革命的成功已经证明资本主义正在走入穷途末路。当然，人们未必不了解中国还远比俄

① 道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第643—645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178，389—390页。

③ 《中国共产党党纲》，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

国落后的社会现实，未必不了解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主要依靠力量的产业无产阶级在中国还处于极不发展的状况之中，但他们却因此更加重视自己与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以致一些人竟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的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助”，即中国革命“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①。

“一切均借俄助”，这句话突出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心理和中国革命的初期特点。历史本身并没有为中国提供足够的实行社会主义运动的阶级条件与物质条件，然而时代和环境客观上却促使着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只能选择社会主义作为自己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毗邻俄国的革命理论、革命经验及其援助，无疑大大地满足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需要。不过，“一切均借俄助”也是一种缺陷。它不仅使中国共产党人最初不能完全按照俄国人的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而且由于他们在理论、经验与物质条件上的缺乏，以致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以俄为师”的心理，并因此使得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最初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失去自身的独立性，使得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很大程度上竟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

由俄国人和共产国际中管中国问题的外国人来决定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这不可避免地要妨碍中国共产党人自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问题。但是，这是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最初只是在一种纯粹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马克思主义最初并没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呢？当然不是。实际上，还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一些人就已经或多或少地注意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的必要性了。他们早就明确提出了“把社会主义的本身下一番切实的研究

^①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广东群报》1921年1月19日；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8月13日。

工夫”，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底现状连起来研究一下”的任务^①。甚至在中共“一大”召开之际，人们还明确地谈到了必须首先在中国联合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各个阶级，推翻“封建老爷”和军阀统治，进而再“推翻那个获得了政权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比较切合中国社会实际的政治主张^②。显然，到了1922年初，人们已经能够进一步提出“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观点，反对做“一定公式的奴隶”了^③。这种情况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随着中国共产党实际地运用它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只是，由于人们最初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及其革命经验的欠缺，特别是由于最初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存在，并直接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监督和指导的局限，中国共产党人在具体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最初不能不是相对缓慢的。

最初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重大实际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不能不是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当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能够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提出切合于中国实际的革命任务之际，是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注意到中国等东方国家革命党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进而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迅速改变他们一度所高举的社会革命大旗，转而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并提出了第一步实行反帝反军阀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第二步实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步走的革命方针^④。同样，也是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率先提出了建立民族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并具体实行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策略主张。毫无疑问，运用马克思

① 《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新青年》，第8卷第5号。

②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

③ 《先驱》创刊号，1922年1月15日。

④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先驱》第4号，1922年6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

主义关于革命阶段论的思想和统一战线的策略主张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这是一次成功的范例。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接受并切实实行了这样的方针和主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20年代中期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

当然，要使纯粹产生于欧洲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适应经济上极为落后的中国的革命实际，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要使作为一种典型的以产业无产阶级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成为一种必须适合于以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基本群众，以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为基本条件的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自然更不可能是那些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外国人所能够完成的。然而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具备这样一种能力。他们这时还极端缺乏革命的具体实践，因而明显地缺少对中国革命本身的发言权，这使得他们只能紧紧地依赖于马克思主义书本上那些现成的结论和俄国革命的那些现成经验。甚至，就在共产国际已经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性质，帮助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苏联并全力支持国民党实行军事革命的方针之后，中共中央也并不相信在中国就可以有与俄国不同的革命道路存在。十分明显，注重意识形态的指导意义的共产党人，这时更习惯于从现成的结论和经验出发来认识问题。为此，他们明确批评致力于军事革命的国民党不该“占一隅之地，养数万军队”，搞什么军事革命。他们断言：“在理论上，应该先有了强大的革命党，然后才能有革命军队，有了革命军队，然后才能有革命政府。而实际上广州革命政府并不是照着这个理论成立的”。在中国也和俄国一样，只有一条道路好走，“就是只有全国工人、农民、兵士之联合的大暴动，……才可以实现革命的军事行动，才可以掀起全国革命的高潮及热忱，扫荡旧污，建设新国”。而要实现这样一种工农兵联合的大暴动，国民党就必须立即放弃他们所控制的广州政府及其军队，

全党动员“到民间去”^①。

把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特别是俄国革命的现成经验机械地套用到中国革命当中来，这在中国革命的最初阶段一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而在涉及如何争取革命胜利的革命道路问题上，共产党人最初所表现出来的对以俄国十月革命为代表的欧洲社会革命方式的迷信，就更加典型。因为无论是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and 世界各国社会革命的实践，都没有提供过除了群众性的总同盟罢工和总暴动以外的任何一种革命的形式。能不能设想另外一种革命的方式呢？在这方面，斯大林多少表现出某种远见卓识。他明确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②承认中国革命具有不同于欧洲社会革命的特殊的武装革命方式，这在斯大林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事实上他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共产党人应当为实现十月革命方式的群众起义而努力的思想，他在承认了中国革命的这种重要特点之后，只是要求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比如加强其政治工作，研究军事，直至逐渐担任某些军事领导职务等等。显然，他还没有意识到，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未来的革命多半也只能是武装的革命。因此，当国民党公开实行分裂之后，不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人们所能够想到的革命方式，多半也只是群众性的武装起义和武装暴动。而由此出发，人们甚至迅速地开始把中国革命的程度与俄国革命的历史相类比，并且公开树起典型俄国式的苏维埃革命的旗帜，寄希望于它能够一举成就俄国革命所成就过的一切。这种情况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那些现成结论，特别是俄国革命的那些现成经验，在人们的头脑中确实是根深蒂固的。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589—591页。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66—267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与矛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不依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的必然过程。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本身，却又不可避免的要受到人们有意无意地干扰和阻碍。这是因为：一方面，人们为了推动中国革命的进展，不能不尽力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和需要；而另一方面，人们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地位，又不能不设法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以使之不被庸俗化。尽管事实上这时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实际上早已被俄国化，而作为中国共产党上级领导机关的共产国际更是直接受命于苏联党的指挥，但人们显然相信：这种马克思主义恰恰是最纯粹、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经过苏联共产党解释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才真正使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从理想变成了现实。

由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事实上日益成为苏联共产党的一种特殊权利，而世界上又只有苏联一个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因此，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并把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教条化，就成为一种难以避免的趋势。到1927年前后，苏联党的领导人及共产国际不仅公开地要求各国党必须使自己国家的共产党实现“布尔什维克化”，而且明确要求他们必须无条件地“从事分析和运用俄共（布）在三次俄国革命中取得的经验”^①。这样一来，用俄国党的标准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来指导与衡量各国共产党和各国革命的情况，自然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要严重地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应当指出，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前，尽管共产国际事实上制订着中国革命的具体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问题上毕竟开始取得了一些进

^① 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2册，第121页。

展。他们这时已经开始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具体考察和区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毛泽东等人已经能够从具体的实际出发提出有关统一战线及土地革命的独立见解。特别是到大革命失败前夕，毛泽东甚至开始注意到组织和保持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为此并提出了“上山”的思想。而大革命刚一失败，他就尖锐地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论断，断言共产党的失败正是失败在没有掌握革命武装上^①。不难看出，通过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人中已经开始产生了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强烈愿望，人们并开始进行着积极的探索。

但大革命的失败，毕竟把共产党人引上了武装起义的革命道路，从而使共产党人骤然置身于一种从未经历过的严峻局面之中。这种情况不能不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渴望借助于来自共产国际的指导和俄国革命的经验，而这恰恰适应了共产国际这时强化俄国革命模式和把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需要，因而极大地助长了党内那种对共产国际和俄国革命经验的依赖倾向。随着斯大林开始拿中国革命的失败与俄国1917年7月的失败相类比，人们很快就开始相信，中国革命必将迅速走向自己的“十月”。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进入苏维埃阶段的说法，无疑更加助长了中共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情绪。一时间，不论条件成熟与否，到处是一片暴动之声。直到一系列暴动先后失败，由共产国际代表乃至苏联外交人员亲自出马的广州起义也迅速失败之后，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这种简单的模仿和类比是不适宜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最先注意到有必要实行区别于俄国革命模式的游击战争和武装割据方式以保存实力的，并不是俄国人，却是最早提出“上山”思想的毛泽东。因为，当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军事上出现不利局面时，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除了带领部队撤上井冈山实行武装割

^① 《八七会议》，第58页。

据以外，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考虑到这个时候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中国共产党人，都在试图把中国革命引上纯粹俄国式的苏维埃革命道路，毛泽东把革命的基地建立到偏僻的山乡里去，建立到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份的农村当中去，这不能不使得那些格外注意苏维埃革命的无产阶级形式的中共领导人感到严重不安。为此，他们立即给了毛泽东以严厉的处分。然而，事物发展的逻辑很快就证明毛泽东的作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就连共产国际也不能不注意到应当把握暴动条件和时机，因而提出了在条件不成熟时不妨采用游击式的战争和小面积的农村割据的问题。这种情况至少说明，中国革命多半并不是已经到了俄国的1917年7月，而且“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①。

当毛泽东和共产国际最初采取这种“游击式斗争与农民割据”方式的斗争形式的时候，显然还并没有把问题的认识提升到理性的高度上去，他们这时多半还只是从策略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但是，在城市中的起义统统失败，而农村中武装割据却明显地容易取得成功的情况下，那些习惯于从意识形态考虑问题的人们没有理由不怀疑：这是否仅仅是个策略问题？为此，中共中央一方面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提议，一方面却明白告诉共产国际：许多同志相信“这样干不会成功，因而悲观”。很显然，在人们的头脑中，这种“游击式斗争及农民割据”方式未免距离俄国革命模式太远，它怎么可能引导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走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呢？当然，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中共中央终于开始相信中国不可能仅仅靠一两个或者更多一些的中心城市的暴动一举夺取全国政权了，他们甚至第一次注意到中国“工人与农民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地域上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和中国社会实际上没有中央政府，“经济生活上是许多半

① 瞿秋白：《武装暴动的问题》，《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10期，1927年12月19日。

独立的区域”，各地的军阀统治也有强有弱这样一些事实。可是，他们依旧相信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在“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是可能的”^①。这也就是说，人们在观念上多半还是在用俄国革命的模式考虑问题，即相信除了在中心城市实行暴动夺取政权的这种俄国式的革命方式以外，任何别的革命方式都只能是非无产阶级的。这也就难怪中共“六大”召开时，当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明确肯定暴动政策是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的最后斗争形式之后，一些人立即开始公开指责“割据”是非无产阶级的，并宣称所谓一省数省、一县数县首先胜利的观念，也都是革命的阶级性所不相容的“农民割据”的观念，是以农民游击战争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旧式农民革命的观念来指导今天的中国革命，结果只能使革命失去城市工人的领导，最终使苏维埃的暴动政策失去其实际价值。

先有成套的来自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观念，后有党的生长和革命，这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由于语言文化、知识结构、理论素养的种种差异，以及研究时间、研究条件的极度匮乏，特别是两国社会结构、历史传统和革命内容有着极大的不同，使得必须按照这种已经被俄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念行事的中国共产党人，往往在重要的历史事变关头，难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付诸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从而不能不依赖于共产国际的帮助。在以典型的俄国式的“苏维埃”作为自己的革命旗帜和革命目标之后，人们就始终在革命的性质、阶段、形势、任务、对象、动力等等概念上纠缠不清，因为中国革命的一切实际条件都明显地与俄国当年有所不同，而人们却必须尽可能严格地把它们统统捏合在一起。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关键原因并不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当中共中央有人仅仅是出于通俗的考虑提出应当改“苏维埃政权”为“人民

① 秋白给国际的报告，1928年2月8日。

政权”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就大为光火。在中共六大上，布哈林则宁愿花上“十倍的时间”去向那些在他看来简直象“在街上散步的中国小姑娘们”一样幼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通俗地解释“生活不是一个赤裸裸的圆球”，也不愿去认真考虑如何使俄国的革命形式转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①。事情很清楚，在共产国际的字典当中，“苏维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俄国特有名词，它已经成为一种包含着具体的革命内容，标志着具体的革命阶段和革命形式，并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成功范例的革命模式。人们绝不能怀疑它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同样也绝不能拒绝把它作为自己国家乃至世界革命的具体斗争形式和根本目标。因此，尽管在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承认了中国革命已经出现的割据苏区和工农红军存在的合理性，结果却仍旧不能想象它们存在的具体方式。布哈林声称，红军在一个地方长期割据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必然会把当地的母鸡都吃光。因此，他仍旧相信，革命的成功终究还要靠群众暴动解决问题^②。而在他们主持下制定的政治决议案中，他们照样机械地仿照俄国1917年7月以后布尔什维克的样子，规定了中国革命的苏维埃形式，并明确限定共产党人只能以工人、农民中的贫农作为革命的动力，而以城镇下层小资产阶级和农村中的中农为可能的却多半是动摇的同盟者，同时则必须把其它一切社会阶级看成是自己的敌人^③。

把阶级政策极端化并把革命手段模式化，其结果只能导致新的左倾盲动主义。但是，就在以李立三为代表的新的左倾盲动倾向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等人所领导的农民割据和工农红军的游击战争，也显示出其特有的生命力。这种情况不能

① 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1928年6月29日。

② 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1928年6月29日。

③ 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1928年7月9日。

不渐渐改变人们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的设想。毛泽东首先认识到中国存在这种与俄国革命完全不同的“奇怪现象”的特殊原因，并注意到它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可能具有的特殊意义^①。而1930年，斯大林也终于开始肯定中国的情况与西欧不同，不仅不存在象俄国革命一样一举夺取政权的可能性，而且只能从敌人统治最薄弱而党的工作最发达的地域开始，首先创立和扩大红军，建立和扩张革命的根据地，然后一步一步有力地向外发展，最终夺取中心城市。据此，共产国际终于开始重视中国的红军及其农村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问题，承认中国革命“必须在暂时还不是苏区的地方，发展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用农民风潮底铁围来包围当地的都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的都市，在军阀军队里组织我们自己的力量，十倍加强我们在这些军队里的工作，……只有这样，才可以准备大工业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才可以准备由武装起来的工人和红军来占领这些城市”^②。

应当肯定，从一味强调以城市工作和工人工作为重心的，坚持以中心城市的起义为革命根本出路的俄国模式，到承认中国革命具有不同特点，主张中共中央应当把工作重心转到农村根据地和红军工作上来，甚至日益把红军和根据地视为中国革命高涨的“决定性因素”^③，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个值得肯定的重要进展。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人们由此开始摆脱了前此那种僵化的思想方法，因而能够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来考虑和制定自己的政策了呢？事情却并非如此。与此相反，由于共产国际仍旧固执地相信只有它才具有最准确地表述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因此它事实上并没有也不可能从这种变化中发现它所存在的严重脱离实际的倾向。不仅如此，它甚至为了使中国党更忠实和更自觉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竟不惜亲自出面干预中共党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5页。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的信，1930年10月。

③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119页。

内的组织事宜，以便把它认为信得过的大批留苏学生安插到中共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这确实是一种强烈的反差。一方面注意到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需要，修正了僵化的革命模式；一方面却又生怕中国革命脱离俄国式的革命轨道，以致强行使之“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这毫无疑问只能促使中国党内教条主义的倾向进一步极端化，从而使它全力加强根据地和红军工作的大胆尝试变得毫无意义。甚至可以说，恰恰是由于共产国际所信任的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出现在中国各地的农村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上，才迅速导致了中共在几年之后的严重失败。因为正是这些只习惯于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教科书以及有关决议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的“布尔什维克”们，把一切适足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的僵化的阶级政策、土地政策、经济政策、军事战略以及党内倾向斗争等等，全面引向了极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实现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首先就是一个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的过程。而与此同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由不自觉向自觉转变的过程。十分明显，苏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原则上其实并不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具体结合。由上所述，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确也曾努力使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能够适应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然而问题在于，他们毕竟缺乏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的条件与可能，可是他们坚持以他们的经验和看法来作为评判一切是非黑白的基本依据，又导致他们事实上充当着某种宗教裁判所的角色。这自然会妨碍他们理智地了解自己的能力，以致促使他们往往盲目地反对任何一种试图脱离俄国的书本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事实上只能由中国人

自己来完成。

要在共产国际还直接决定着中国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而党内教条主义领导人多半不仅不敢越雷池半步，并且对党内一切不同见解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情况下标新立异，这无论如何是难以设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之所以直到30年代中叶以后才得以明确提出，当然是同这种情况有密切关系的。从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三省之后，共产国际逐渐开始根据中国国内情势发展的实际需要重新提出统一战线政策，而当时的中共中央却迟迟不能理解，以致失去了挫败国民党围剿的机会这一情况看，可以知道教条主义者往往是比那些制造教条的人头脑还要僵化得多。但也正因为如此，当共产党人由于教条主义领导而造成的惨重失败已经成为一种严酷的事实之后，中国党内出现要求反对教条主义倾向的愿望，并且通过更换领导人的方式来达到摆脱盲目的教条主义统治，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

必须指出，在1935年以后，一方面中共领导层的改变和第一次远离共产国际的指导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实践的经历，为人们最终走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打下了重要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关于“不要机械地把一国的经验搬到别国去，不要用呆板格式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及关于今后“在解决一切问题时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的决定^①，无疑也为中国共产党人大胆地进行独立的革命实践创造了重要的条件。毫无疑问，中共这时的主要负责人张闻天就是在传达共产国际“七大”这一决定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应当把共产国际有关决议“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的思

①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莫斯科1939年版，第4—5页。

想的^①。

要把共产国际指示“民族化”，其实质就是要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尽管张闻天这时关于“民族化”的提法主要还是鉴于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很少涉及中国问题这一具体情况而言的，但是，要把国际指示“民族化”，这本身就说明，人们已经开始格外重视中国的“具体环境”了。当1936年中共中央经历了从统一战线问题的提出而导致的一系列基本政策的重大调整，甚至不能不完全放弃了俄国式的苏维埃革命方针之后，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及俄国革命经验必须适合于中国社会客观实际的体会，无疑变得更加深刻了。因此，在1937年5月中共党代会上，根据国共两党合作的新形势，张闻天不能不更进一步强调中国的“具体环境”。他明确表示：“现在严重问题就是如何灵活的应用马列主义到中国的具体环境中来”，必须“要将理论与实际统一起来”，因为实践已经证明，“现成的到处适用的药方是没有的”。显然，在共产国际也已经特别注意到必须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对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进行具体分析的情况下，中共领导人必然会更加迅速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但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并非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首先，共产国际提出必须对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反对公式化的问题，其实主要还并不是对各国党自身的要求，而是对自己本身工作的一种原则规定。也就是说，共产国际实际上还并没有放弃它在政治上对各国党的领导 and 监控地位，各国党自然还必须执行它“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而为这些国家共产党制定的“基本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②。因此，共产国际这时不仅仍旧对中国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明确指示，而且还特别派回它所信任的长期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工作的王明等人

① 《张闻天文选》，第82页。

②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第4—5页。

来贯彻它所制定的政策路线。其次，由于共产国际在中国党内具有极高的威信，而长期以来人们还不习惯为自己标新立异，加上党内王明等相当一批带有教条主义倾向的领导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理论思想方法存在着与中国革命实际严重脱节的情况，因此，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保持独立自主的思想方法和敢于实事求是的政治勇气，不能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显然，这一工作只是当毛泽东与王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思想斗争，并一度取得了共产国际的好感，因而支持毛泽东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才变得容易了一些。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正式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后，开始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他突出强调“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特别是使之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的问题。他公开号召：“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之所以首先强调的并不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而是使外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的问题，这是有着特别的政治意义的。

早在30年代初，毛泽东就已经注意到党内存在某种轻视实际，唯书唯上的倾向，因而提出过反对“本本主义”的观点^②。现在，毛泽东更进一步地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其核心明显地仍旧是反对“本本主义”的问题。很显然，由于王明等人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又在苏联学习、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工作多年，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较多，因此，他们明显地更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更容易影响党内大批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00页。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11页。

在教条主义盛行期间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和多数出身于农民的普通党员，从而妨碍毛泽东等人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来提出有别于俄国式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的独立政治理论见解，甚至妨碍他们根据中国的实际进行独立的工作。因此，毛泽东这时不能不急迫地提出了反对洋八股以及教条主义，而代之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使之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的艰巨任务。可以肯定，在毛泽东看来，只有首先使马克思主义彻底中国化、民族化，才真正有可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要想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则又必须深入地了解和熟悉中国社会，即必须首先做到立足于中国实际。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按照毛泽东的看法，最主要的显然就是要立足于中国实际，即必须时时处处地站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毛泽东后来曾经直接了当地指出王明教条主义问题的要害，就是想自己的事情想得太少了，而替别人考虑得太多了。不难看出，这正是毛泽东以及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共产国际以及党内各种教条主义者的根本分歧之所在。因此，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从一开始就不能不成为一个带有尖锐的针对性的问题。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这一问题的性质自然已经超出张闻天关于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中来的内容，而渐渐开始走向与共产国际指导思想相对立了。这是因为，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挥中心的共产国际，早已是一个以苏联利益为基本政策出发点的国际主义政治组织了。长期以来，它所制定的各种政策和策略，几乎都是以苏联的现实需要为转移的。它从来主张，各国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都应当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来保卫社会主义苏联的安全。它的理由是，世界上只有苏联才是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然而，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恰恰是要求人们必须以中国革命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政策和策略的基本出

发点，反对任何以苏联为中心来考虑问题的倾向。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正是向那种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主义”原则提出的强有力的挑战。

究竟是应当以中国为中心来制定政策，还是应当以苏联为中心来制定政策，这个问题终于在1940—1941年通过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人围绕着对国共关系的不同考虑，和德苏战争爆发后苏共中央与中共中央在援助苏联问题上的分歧，尖锐地反映出来了。十分明显，中共中央坚持只能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和客观可能出发来考虑一切问题，把中国革命的利益放在一切关系的首要地位。这种情况的出现，清楚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实践毛泽东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原则了。当然，也是从这样一种基点出发，中共中央迅速开始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响，进一步独立自主地根据中国的实际，特别是中国革命的需要，来具体地和全面地制定和完善自己的各项方针政策了。与此同时，真正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也自然而然地要提上议事日程了。

从1941年9月，毛泽东开始在党的最高层展开对党内教条主义领导人王明等人的思想斗争，到1942年2月，他又趁热打铁地展开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经过三年之久的思想解放和思想教育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终于得到了全党的支持和肯定。至此，马克思主义真正被赋予了一种鲜明的中国民族形式，即毛泽东思想的形式。中国共产党开始正式承认以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最高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终于达到了它的基本目的。

（责任编辑：李林）

（作者杨奎松，195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